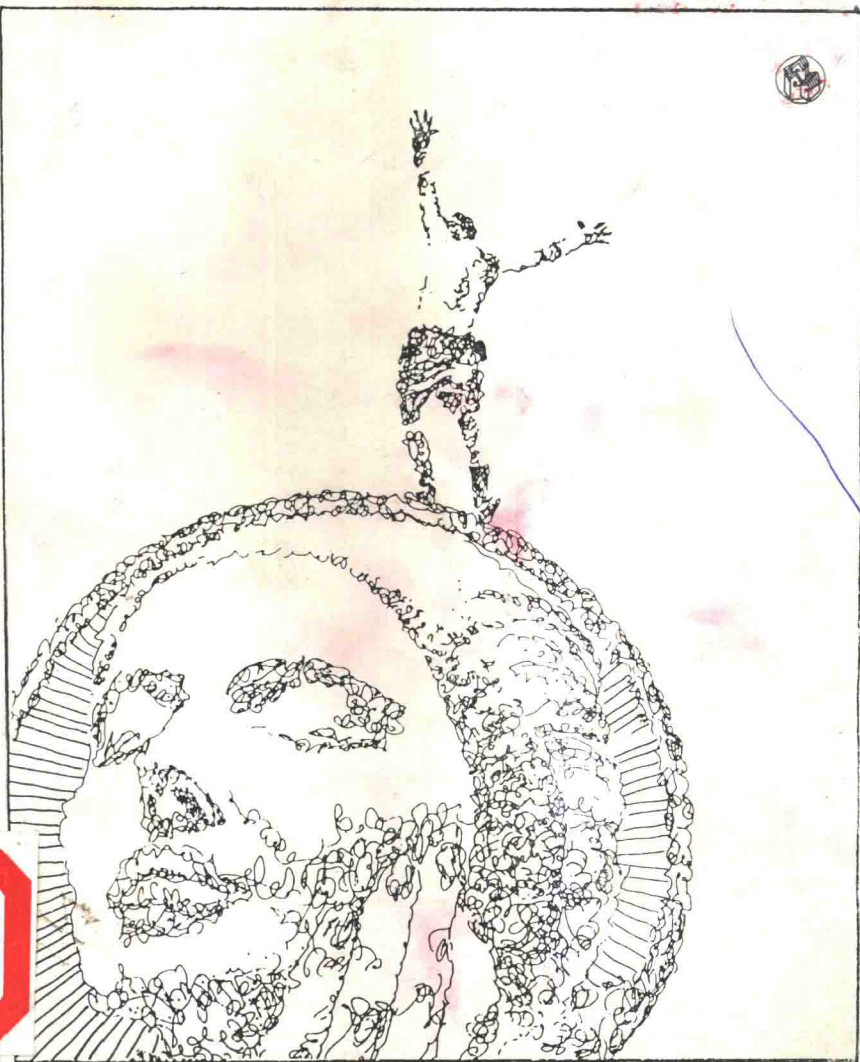


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

〔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 著 俞敏洪 包凡一 译 地球村理论库



2
3

改革时代 —— 美国 的新崛起

〔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 著

俞敏洪 包凡一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改革时代

——美国的新崛起

[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 著 俞敏洪 包凡一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8.75印张	216,000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85元	

ISBN 7-202-00326-0/K·4

地球村理论库

顾问：戴逸 郑杭生
沈德灿 许爱仙
牛素琴

主编：高崧

副主编：邓正来（常务）
吴儂深 李盛平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硕 王 伟 牛大平

邓正来 白若冰 刘 溢

张志铭 张京媛 肖金泉

李世琦 李保平 李盛平

杨韶刚 吴儂深 周 星

范 进 赵雷进 高 崧

贾 湛 程方平 覃光广

编者致辞

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社会里，比邻于一个村落的人群，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当代社会，栖息在一亿五千万平方公里地球陆地上的50亿人，却有如共居在一个村落里，彼此息息相通，往来不绝。地球大小依然，前者是咫尺似天涯，后者真是“天涯若比邻”。

随着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前进，世界经济多样化的联系日益紧密，地球村的居民的相互依赖性日甚一日地加强了。

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10亿中国人，在不久前还把自己封闭在地球村的一个角落里。有道是“山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放眼世界，地球村起了多大的变化！猛醒的10亿人，立即朝着“改革、开放”的路子迅跑。

中国要在世界上保持它应有的地位，10亿人要人人都是地球村里合格的居民，不仅要赶紧在经济上起飞，也要刻不容缓地在科学、文化上猛进，没有后一着，人的素质无由提高，伟大的历史性变革无从实现。

我们把这套丛书取名为“地球村理论库”，意在为知识界、读书界提供一批当代新知识、新思潮的图书，从中汲取世界文明的新成果，有助于他们立足本位，放眼世界。相信我们这个朴素的愿望，不会是奢望。

地球村理论库编委会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土地神话和商业现实	(17)
一、自耕农和神话	(17)
二、农场主和现实	(28)
三、是边疆还是市场	(43)
第二章 平民主义运动的民间特征	(48)
一、两个国家	(48)
二、历史是一种阴谋	(57)
三、骠武精神	(67)
第三章 从哀怨到平价	(77)
一、反败为胜	(77)
二、黄金时代	(90)
三、乡下佬的消失	(99)
第四章 地位革命和进步党领导人	(108)
一、财阀与共和党独立派	(108)
二、专职人员的异化	(123)
三、从共和党独立派到进步党	(136)
第五章 进步主义的冲动	(145)
一、城市景象	(145)
二、揭露黑幕：新闻革命	(155)
三、现实与责任	(165)

第六章 同组织的斗争	(179)
一、组织与个人.....	(179)
二、国家和托拉斯.....	(189)
三、公民和政治机器.....	(214)
第七章 从进步主义到新政	(226)
一、进步主义与战争.....	(226)
二、幕间小品.....	(235)
三、新的开端.....	(252)
四、新机会主义.....	(264)

导 论

如果从南北战争到1890年美国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工业化、大陆扩张和政治保守的时代，那么，自1890年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则可以被看作是改革的时代。改革的浪潮虽然在1890年几乎消退，19世纪20年代又短暂地回升，但却决定了20世纪美国政治的基调。过去65年中，改革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农场主抗议表现最强烈的1890年平民运动和1896年布赖恩^①竞选活动；1900—1914年的进步党运动；30年代的几年中集中迸发出活力的新政运动。

这本书并不是为了把大家熟悉的自1890年以后美国主要改革运动重述一遍，而是为了以我们现时代的观点对这段历史作出新的分析，起先，我的兴趣是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但在研究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要更好地理解这一段历史的特点，就应该把它与“新政”比较。为此，我增加了最后一章。虽然它不能被理解为对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关系作出的最后结论。现在，我们距离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3月4日第一次就职宣言，比他距离伍德罗·威尔逊^②的第一次就职宣言时间更长，因而，可以用更成熟的眼光来看待“新政”。甚至“新政”以前的改革在我们看来也有新的意义。我们站在了从未有过的高度看问题，发现原来当作偶然事件的重要意义。

①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1860—1925)：美国政治家。民主党杰出的演说家和律师。曾三次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均落选。1913—1915年任国务卿。

②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1856—1924年)：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译注

事实上，我们关于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观点与我们在“新政”时期的经验紧密相关。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时代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猝然告终。当我们准备为这一时期作出严肃的历史评价时，却又陷身于大萧条之中。因此，在“新政”时期或“新政”后不久出版的论述这一段历史的著作，都不免带有第二次改革浪潮的印记。这并不是说这些观点通常带有同情的意味，而是说这些观点都被一个错误的观念支配着，即“新政”是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传统的延续和再生。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但它却转移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无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歪曲了我们历史的特点。我在本书中将着重强调这些区别。

也许我得解释我在很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的术语——“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我说的“平民党”并不仅仅指涉1890年的“人民党”(或称“平民党”)，因为我认为平民党只是美国政治文化独具的大众化冲动，在特定时期的夸张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观察到，远在1890年抗议之前，安德鲁·杰克逊^①时代就存在一股强大的趋势，导致了南北战争以后的绿票子运动^②、格兰其运动^③及反垄断运动。这些运动是广大的农民、商人对19世纪后期的经济变革不满的反映。平民主义精神在1896年指导了民主党，并继续在以后的进步主义时期发挥重要的作用。平民主义的

①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年)，美国第七任总统。——译注

② 美国农村利益集团发起的旨在增加或维持纸币流通的运动，约发生于1868年至1888年。1862年—1865年间，联邦政府为准备南北战争发行了4.5亿以上的美元(即绿票子)，没有黄金储备。战后财政上的保守派要求收回绿纸币，引起希望保持高物价的农村利益集团的反对(大多来自中西部)。他们在1874年组成绿票子党，经过他们的努力，1878年国会达成妥协方案，其中包括：保留恢复硬币支付法案；扩大可以兑换成黄金的纸币流通量；制订有限制地恢复铸造银元的布兰德·艾利森法案。1878年后绿票党人又掀起了无银铸造白银运动。——译注

③ 格兰其(Grange)(1867年成立的美国全国性保护农民利益的田庄农民秘密组织，正式名称为“保护农业社”)格兰其意为该社成员。——译注

思想与农业改革的特殊关系现在已经不能看得很清晰了，但我相信它在我们的时代继续生存着，部分地表现为人们暗藏着的地方感情^①，大众的和“民主的”反叛精神以及怀疑主义和排外主义。

同样，我说的“进步主义”也不是指由共和党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支持西奥多·罗斯福^②的激进分子组成的进步党(布尔·莫斯^③)。我用这个术语实际是指1900年后兴起的广泛的批判精神和改革精神。1900年后原已十分壮阔的农场主抗议运动，因中产阶级对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热情而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发展。一切有观察能力的同时代人都意识到，在这个广阔的意义上，进步主义运动不能仅仅被说成是进步党的运动。它强烈地影响了大大小小许多政党，改变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基调。当然，这个运动的许多方面是模糊并且是不和谐、不连贯的，但这或许正是这个运动获得可观的成功——也是它失败的地方——的隐藏着的原因。虽然可以说没有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为动力进步主义运动就不会产生，但这次运动并非所有的社会阶层，或各社会阶层联合的集团对另一个个别的阶层或群体的斗争。它实际上是一个波及广泛的，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参与的，意愿非常良好但目标并不十分明确自我改造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恢复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和政治上的民主。人们普遍相信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和政治上的民主在早期美国曾经存在，而以后被大规模的合作和腐朽的政治机器摧毁了，这种恢复能够复兴失去了的道德和公民的纯洁。

我在这里主要注意的不是选举、立法者的颁布宪法、法庭的判决、制订规章制度的机构的工作，而是运动的参与者的思想——他们的是非观念，他们期望的变革以及在他们看来是可行的手

① 指对城市的不满。——译注

② 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年) 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

③ 布尔·莫斯 (Bull Moose)，进步党运动的别名。

段。因此，我的工作就是探讨参与者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在我们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政治思想和政治环境，但它研究的不是高等文化，而是具有普通政治意识的美国公民的思想。莫顿·G·怀特(Morton G. White)在他的《美国的社会思想》(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一书中分析了进步主义运动对高层文化领域，如哲学、政治理论、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影响。我做的不是这样的工作。我关心的不是最深刻的思想而是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是那些中产阶级趣味的作家在大众读物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幕后新闻、竞选演讲以及有代表性的新闻记者和有影响的时事评论家的文章。当然，高等文化和普通文化经常是重叠、交融的，有些人对这两种文化都能运用。有时，进步主义的更有深度的思考者对我称之为进步主义的重要思想会持批评态度。我没有忘记，当我评论说大多数进步主义者的核心目标是个人主义时，论述这个时代的政治学、心理学和哲学的最重要的学术文章对同样的事物和事件却作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也不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些进步主义的思想家，象赫伯特·克罗利^①，甚至还有一些进步主义的政治领袖，如西奥多·罗斯福对众口一声地呼吁个人主义表示了辛辣的讽刺。知识分子，甚至常常还有我们的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们，通常与他们同情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对这些运动和这些运动所反对的事物同样地持批评态度。困扰着新世纪前后改革者的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问题是，他们为保卫或恢复他们崇尚的个人主义价值而采取的行动，使他们更接近了他们害怕的组织手段。对这个时代有更深刻认识的思考者比参加街谈巷议的人们更多地了解形势。

^① 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David Croly 1869—1930年)：美国编辑和政治理论家。重要作品有《美国生活的希望》(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该书十分重要，曾影响了进步党领导人西奥多·罗斯福的观点。

平民主义运动和进步主义运动发生在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迅速过渡，时而出现动荡的年代。现在我们离这一过渡的完成更近了，因而可以对它的意义有更明确的认识。但我们容易忽视上几代人某种强烈的情感。美国的民主传统是在农场和小村庄里建立起来的，它的基本观念浸透着乡村感情并且是用乡村语言表达的（我们至今还有“草根民主”这个说法）。这是因为在整个19世纪甚至还有20世纪，美国人民都被教导说农村生活和种田是神圣的。美国早期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农场主，“民主”，这个本来就是意义十分宽泛的抽象观念自然变得神圣了。某种自满和自以为正确的意识逐渐进入农场主们的头脑。这种自满受到工业扩张的猛烈震动。平民主义运动中浓重的紧张和焦虑色彩就是因农业美国的迅速崩溃所致。

然而，我们很少注意到，相互竞争但未组织起来的众多农民，作为一种社会势力是软弱的，而当他们人数相对减少而力量增强以后，他们彼此间关系却更和谐，团结得更紧密。平民主义的一个陈词滥调就是，不论其它职业有什么作用，农场主是最具重要性的，因为他们养活了所有其他人。尽管近来我们已经较少听到这种论调了，甚至与其针锋相对的城市居民对农场主的愤恨情绪开始抬头了，但是以往老观念已在美国公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对这种观念的否定是有事实依据的——是我们养活了农场主。在情感上和道德上以农场家庭为理想的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美国，用它可观的剩余财富，支撑了在现代农业技术条件下超过实际需要人数的农场主。正是部分地因为农业传统的作用才使对农民的让步不象其它受技术发展损害的群体——比如说音乐家、建筑商行的工人——采取人为的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那样引起普遍反对。本书导论部份正是用来探讨从19世纪早期田园传说式的民主，到复杂的现代美国生活的过渡性的历史时期。

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兴起的环境在现代社会中是较为特殊

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伴随着人口成份的急剧变化。直到1880年，美国民主的基本思想仍然是乡村式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扬基式^①和清教式的，此时的移民居住区小而分散，不可能建立全民统一的生活观念。工业的兴起带来了当时人们所说的“移民侵入”——欧洲移民，其中大多是农民，持续40年的大规模迁移。这些移民的宗教、传统、语言或者仅是他们的人数就使简单的统一不可能实现。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染上了极浓厚的本地人对移民浪潮的反对情绪。国家对移民的需要和本地人的排斥情绪的摩擦，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伦理系统。我试图给这两类政治思想的特点和相互作用以归纳。第一种建立在本土的扬基——清教政治传统和中产阶级生活上，主张公民应长期地、无私地参加政治生活。这种思想还认为，为了与不同于和高于个人需要的普遍准则及抽象法律相适应，政治生活应有更深刻的内容。经济生活应能刺激与个人发展紧密相联，而政治应努力教化所有的个人。第二种政治伦理体系具有欧洲移民的特殊背景：他们熟悉的不是政治上自由的行动，而是等级制度和权威。他们常常需要为基本的生存而奋斗。他们很自然地认为，个人的政治生活产生于家庭需要。政治和公民间的关系建立在个人义务上，个人的忠诚高于对法律道德的遵守。移民、老板的政治生活和城市机器主要靠于这一价值体系运转。以高度理想化的清教社会改革领袖为一方，以老板、政客和广大移民为另一方，由此建立起来的两套政治理想之间的冲突在很多方面影响了进步主义时期的斗争。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道德甚至宗教上持不同的观点。因此，这一时期的矛盾尽管在实质上是这么微不足道，却能引起如此激烈的冲突和严重的误解，并不让人吃惊。

① 扬基 (Yankee)，原为美国南方人对北方人的谑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对所有美国人的谑称。此处指美国式的，非欧洲式的。——译注

在扬基农村里建立起来的政治价值和政府的观念，受到企业家和个人成功理想的深刻影响。美国政治历史上的左派——即大众改革的发动者，相对地没有与封建传统和城堡里的贵族作斗争的必要。它既没有革命传统——指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革命^①本身是合乎宪法的保守的政治事件），也没有类似19世纪后半叶所有西方大国都曾出现过的那种无产阶级理论和社会民主。美国政治历史上的反叛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反对垄断和特权，反对社会差别，反对限制信贷，反对阻碍个人成功的运动。因为社会平等和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总能得到保证，因此反叛的目标既非社会民主亦非社会平等，而是更多的机会。新旧世纪更替时，大多数人，包括改革者在感情上更接近那正在消逝的社会生活——个体经营，中、小型企业，分散而无严格组织约束的生活。但到了进步主义时期，企业界甚至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越来越脱离个体的形态，而需要工业纪律和管理阶层并呈现出官僚主义的外观了。改革者对此的抗议是要求保证目前正在丧失的机会，而不是要求加速当前的组织化趋势。大多数来自扬基清教环境的美国人，不论是改革者还是保守者，都要求把经济上的成功与个性发展联系起来。他们要求经济机制不仅能够提供充足的产品和服务，而且能够起到有效的刺激作用、成为提供动力的机制。而大企业、豪富阶级、处心积虑的政客似乎都反对这些要求。大企业的成功与个性及奋斗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人们观察那些豪富们的行为，发现他们的富裕程度和他们承担的公民义务和自我克制成反比。竞争的意义似乎消失殆尽了。整个社会受到震动，不是因为经济的崩溃，而是因为道德和社会的堕落及民主风气的退化。但这并不是说那个时代的人们陷于绝望，他们相信，正如罪人可以赎罪得救，只要人民觉醒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民族就可以被拯救。正

① 指独立战争。——译注

是这种期望，激起了进步主义者的热情，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下一个阶级的改革是“新政”。它本身是这个社会过份组织化的产物。这个社会曾经困扰过进步主义者。通向管理，通向官僚主义，通向大型化的趋势已很壮大，对之进行改革的努力本身也不得不与之和谐。更有甚者，随着“新政”的持续，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参与了改革的领导。他们的组织规模使他们足以提出强硬的要求、发挥重大的政治作用。城市中广大移民、政客、工会领导人、知识分子及行政人员的政治和道德信条，与旧的经济道德发生了冲突。某些社会阶层在进步主义时期的有限改革中颇有功绩，此时却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陌生环境——尤其在经过最严酷的经济衰退以后，对周围的新事物变得无法容忍了。“新政”的实用主义精神和不顾一切的追求效果，使这些人距离经济生活与个性、企业自由与机会紧密相联的社会更加遥远了。

平民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试图坚持农业生活的价值，保留成为企业家的机会和个人的机会以及这种条件下的个性特征，保持统一的扬基文明。在我看来，他们的许多企图是倒退的，不现实的，其中有一些很恶劣，但总的说来是滑稽的。我并不是说这些价值本身没有价值或者是坏的。与自然和泥土有关系的如那些亲近的生活理想，对乡村生活中纯朴的人际关系的尊重，独立并且依靠自己的个人美好形象，甚至还有保持全民族统一的伦理观念的愿望（所有的轻蔑和嘲笑都是这种愿望造成的），——这些都不是可以忽略和蔑视的理想。这些价值的崩溃，对有感情的人来说是痛苦的经验，而那些对此只能靠想象来了解的人应该尊重这些价值。我评价这种对农庄和企业家的传统热情，不是为贬低它们作为终极价值的意义，而是为了警惕将其滥用于政治行动。——这种情况过去有，现在仍然有。我这样做，或许能间接指出挽救

那些仍然有意义的价值观的某些方法。

我发现我对平民——进步主义传统所持的态度是批评的态度——比我在15年前假若就此写研究著作，会持有更激烈的批评态度。我说的是批评而不是敌视，批评是一种内省。我是在进步主义的改革传统中长大的，我的政治感情也是建立在这个传统基础上的。这一传统实际就是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传统。也许是因为美国政治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确实是保守的，因此美国知识分子对此的思想反应，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自由”的——即平民主义的、民主和进步的。就全民族的保守主义来说，我们没有能够建立、健全和丰富保守主义思考方式。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①在《自由主义的想象》中所说的那样，除了极个别的人外，我们的保守主义者没有试图用与行动相对的观念来表达自己，他们只有一套“用来表达观念的手势”。美国的实业家在政治观点上是保守的。保守的美国政治家享有广泛的拥戴，常常可以长期掌权并能有实效地为公众服务而怀有荣誉感。尽管我们总是最热烈地赞美有改革家风度的保守政治家。一个有足够才能的保守政治家——罗斯福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既可以享有大企业主和社会关系中的保守势力的尊敬及经济资助，又能利用进步主义的词藻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赢得改革者的喝彩。但是，在过去年代里，保守的知识分子，以及寻求给行动以理性信仰支持的保守政治家，脱离了他原本想接近的主流和基本的群众。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相互批评的风气似乎消失了，结果是双方的人都为自己的知识地位过分自满。保守派没有猛烈和有辩驳力的批评。自由派出于知识分子的本能，热衷于自我批评，然而这种自我批评不如有力和严峻的对手的批评对他们更有益。

^① 莱昂内尔·特里林 (Lionel Tivilling 1905—1975年)，美国作家和批评家。

这种局面持续到当今，也许是自 1890 年以后第一次有所改变。此时出现的一些迹象表明，某些自由派逐渐发现享用一下保守主义的词藻和快乐既是自然的也是合算的。他们发现，对自己乐于保持的事物比对乐意改革的事物有更强的意识。1952 年，如此谨小慎微和严肃的绅士艾德莱·史蒂文森^①能够激起美国知识分子的巨大热情就是这种保守主义倾向的明证。史蒂文森在竞选过程中曾断言，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的话所以正确并非因为自由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普遍地倾向于保守主义（确实，他们的情感和忠诚的对象另有所属），而是因为他们感觉到，在我们这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中寻找出路的同时，应该抓住已经得到和学到的东西，以便在可以计算的将来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应该抛弃过去 20 年的社会成就和美国传统中优秀的东西，一味沉醉于代价高昂的假象中，否定不应该否定事实上不能否定的东西。

我对平民主义——进步主义传统的批评部分地是出于对它的保守主义色彩的反应。我不愿意将这些批评与我们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联系起来。这个词太时髦，让人不舒服。“新保守主义”这个词在我看来，只表明了美国依然不能泰然自若地看待无偏见的保守主义思考方式。我们应该明白保守主义中一切好的东西，都确实是久已有之的，如果美国最优秀的保守主义者约翰·亚当斯还活着，就可以教给你。宣传中叫作“新保守主义”的东西，在我看来象是粗糙的商业广告，它自身是对美国社会对变化的不断要求的投降，从而表现为对保守主义的背叛。美国人喜爱所有贴上“新”和“大”的标签的东西，然而保守主义的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在对过去，对细腻感情的珍惜以及对管理、方法、意义等等事物中“小”的方面的感情。“新保守主义”与其它任何东西一样，

^① 艾德莱·史蒂文森(Adlai Ewing Stevenson 1900—1965年)；曾在 1952 年和 1956 年两次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译注